

諮商師在婚姻諮商情境中 問題概念化的性別偏見

郭麗安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諮商師在婚姻諮商情境中問題概念化的性別偏見，根據 58 名諮商師觀賞婚姻諮商實況錄影帶後所填答之問題概念化問卷，說明諮商師的性別偏見情形，並比較不同訓練層級、性別、與婚姻狀況的諮商師間的差異。

研究結果發現，諮商師在概念化夫妻問題時，與性別偏見有關的七個主題類別出現次數的多寡，依次為「中立」、「偏袒妻子」、「偏袒丈夫」、「反對丈夫」、「社會文化意識」、「性別意識」、與「反對妻子」。整體而言，新手與專家層級諮商師在使用偏袒/反對當事人夫妻四個類別的次數上無顯著差異，但在使用「性別意識」、「社會文化意識」與「中立」等類別的次數上，專家層級諮商師則顯著比新手多。

就相關分析發現，「工作年資」與「性別意識」、「社會文化意識」、「中立」呈顯著正相關；而「性別意識」、「社會文化意識」與「反對丈夫」相互間亦呈顯著正相關。此外，不同性別的諮商師在使用七個類別的次數上無顯著差異；已婚諮商師較未婚諮商師使用較多的「中立」類別，而未婚諮商師在「偏袒妻子」、「反對妻子」及「偏袒丈夫」的類別上，使用的次數較已婚諮商師多。

本研究除整理及討論研究發現外，並對未來諮商實務及教學提出建議。

關鍵詞：性別偏見、問題概念化、婚姻諮商、諮商師

緒 論

三十年前，心理諮商界即開始注意性別偏見之議題（Broverman, Broverman, Clarkson, Rosenkrantz & Vogel, 1970）。在婚姻或家族治療的領域中，性別偏見更是不可忽視的因素，因該因素足以影響諮商師的治療策略及手法，進而影響療效（Daniluk, Stein, & Bockus, 1995）。過去二十年來，女性主義學者大力倡導將性別議題納入婚姻與家族治療的理論、訓練與實務工作當中（Haddock, Zimmerman, & Macphee, 2000），因為，在婚姻的問題中往往隱藏了性別之議題。

近來，更由於後現代主義思潮之影響，性別議題在系統性家族治療（systemic family therapy）的領域中吸引更多研究者的目光（Burke & Daniel, 1995；Hare-Mustin, 1987；Hoffman, 1993；McHale & Carr, 1998）。後現代的治療師顯然比傳統的治療師較常關照性別、族群、階層等具有文化意涵之元素，他們相信上述元素建構了個體在婚姻、家庭、治療關係、社會政治（sociopolitical）、及文化上的位置（Burke & Daniel, 1995；Hare-Mustin & Marecek, 1988；Jones, 1994）。置身在婚姻諮商情境中的三方——夫、妻與諮商師均帶著他們從其文化對性別所建構之期望進入治療。舉例而言，夫、妻雙方會將他們的性別角色期望投射在諮商師身上，反之亦然（Newberry, Alexander, & Turner, 1991）。

歸納過往之研究，在婚姻諮商中，性別至少會透過以下兩種途徑影響療程與療效：（1）夫妻對問題之知覺，（2）諮商師對問題之知覺。以下即針對此兩點以及過去有關諮商師的性別偏見之研究做一整理與探討。

一、性別影響夫妻知覺婚姻問題與設定諮商目標之相關研究

個體對壓力的知覺和經驗與其社會角色是有關聯的（Polefrone & Manuck, 1987），在婚姻關係裏其意涵尤其明顯。研究顯示，工作帶給男性的壓力要比女性大，而婚姻帶給女性之壓力卻顯著高於男性（Aneshensel & Pearlin, 1987）。之所以如此，心理學家提出的說法是女性的自我認同建構於關係（relationship），而男性的自我認同建構於分離（separateness）（Gilligan, Lyons, & Hamner, 1989）。

兩性社會化歷程之差異會使得他們在關係中接收、解讀資訊的方式與結果均不同（Conway & Krumboltz, 1998）。研究顯示，當婚姻被解讀為有問題時，女性

會著重於關係中的負面資訊，男性反而會看重正面之資訊 (Conway & Krumboltz, 1998)。用深層的心理結構來解釋，乃因女性的自我架構在關係中，一旦關係發生困難便帶給女性強大之威脅感，選擇性注意的結果便是將注意力集中在負面資訊上 (Conway & Krumboltz, 1998)。而男性較不看重關係，或在關係中擁有較多之權力 (Basow, 1992; Cook, 1990)，因此負面資訊便比較不具威脅性，注意力也就減低，問題之嚴重性會被淡化 (Worden & Worden, 1998, p. 49)。另有一說是，男性在關係中較傾向逃避衝突，所以就不會注意負面資訊 (Notarius & Pelligrini, 1987)，而以系統論來看，丈夫的這般逃避負面資訊，反而造就了妻子更要強調負面資訊，以吸引丈夫投注更多的心力於關係中 (Markman & Kraft, 1989)。

因為夫妻對婚姻問題之知覺有所差異，所以他們在諮商室中所陳述的問題來源與諮商目標往往也是南轅北轍 (Gray, 1995)；以 Gold (1997) 的研究發現為例，即便夫妻都為親密 (intimacy) 困擾而求助婚姻諮商時，丈夫與妻子所指涉的親密卻有截然不同之意涵，諮商師若缺乏性別意識便無法瞭解夫妻關係真正的困難所在 (Vatcher & Bogo, 2001)，更遑論達成治療目標。

相對於個別諮商，由於其只涉及單一個案，諮商師在定義諮商目標時，要比在婚姻諮商中輕易得多，而婚姻諮商中的夫妻兩人對會談往往具有不同的期待 (Hendrick, 1995; Werner-Wilson, Zimmerman, & Price, 1999)，諮商師如果不了解女性在社會化過程中有較為順服且樂於改變的傾向，便會漠視女性案主的諮商目標，反而著重丈夫之諮商目標。

根據 Knudson-Martin 及 Mahoney (1996) 的研究指出，在婚姻諮商的情境中，妻子往往比丈夫有更高的改變意願，即便丈夫不認同她的諮商目標，但只要丈夫在治療室中表示聽見了她的心聲，就滿足了她對治療之期待，因此妻子很容易便順應了諮商師及丈夫對她的要求。諮商師若不具性別意識與文化敏感度，在諮商過程中往往便只要求樂於改變的妻子自我改造，如此一來，正好複製了女性主義治療師常批判的「男為主女為副」的社會文化現象 (James & McIntyre, 1983)。

性別也影響當事人對不同治療形式 (modality) 的投入程度，根據 Werner-Wilson (1997) 的研究顯示，與家族治療比起來，妻子在婚姻諮商中較能自我表達與工作，丈夫則正好相反。究其原因，因家族會談比婚姻會談動用到的次系統較多，而丈夫與諮商師都較喜歡在具有階層 (hierarchy) 體系的情境下工作，因此丈夫在家族治療中較能工作。就妻子而言，婚姻諮商的內涵較家族治療處理更

多親密與感受的問題，而此點符合女性的社會化過程，使得她們在此諮商脈絡中更為自在 (Werner-Wilson et al., 1999)。此外，婚姻諮商的情境比家族治療更常挑戰婚姻中不公平的權力分配現象，而妻子在家族治療中卻常感受到要為家庭困擾負責 (Luepnitz, 1989) 等因素都使得不同性別的案主在不同的治療形式有不同之反應 (Dressel & Clark, 1990; Werner-Wilson, 1997; Werner-Wilson et al., 1999)。然而，研究也顯示，女性案主如果對諮商師的言詞感到困惑或甚至察覺被性別歧視，通常也不會挑戰諮商師，因挑戰權威不符女性的社會化特質 (Werner-Wilson et al., 1999)。

上述這些婚姻諮商中的性別現象，除了說明性別是婚姻諮商歷程中無可規避之議題外，也闡明當事人所處的文化脈絡對其性別角色之期待會模塑他們對治療的行為回應，這也就可以理解為何許多諮商學家視文化敏感度之訓練為二十一世紀諮商師培育教育中不可或缺之一環了 (Corey, 1996; Sue, Ivey, & Pederson, 1996)。

二、性別影響諮商師對婚姻問題概念化之相關研究

婚姻諮商是一複雜、充滿動力的人際互動歷程，其中十分倚重諮商師的評量 (evaluation)、推斷 (inference)、和闡釋 (interpretation)，若非有充分之訓練否則不足以成就一位勝任之諮商師。八〇年代以後發展出的一些研究，除探討諮商師對案主問題的概念化 (conceptualization)、闡釋與療效間的相關外 (Matsui, 1988)，還比較新手與專家層級諮商師在概念化案主問題間之差異性 (賀孝銘，民 88; Bereiter & Scardamalia, 1987; Ettenson, Shanteau, & Krogstad, 1987; Wiedenbeck, 1985)，這些研究均指出訓練對諮商師概念化案主問題能力之重要性。

一般而言，新手與專家層級諮商師的差異表現，在於他們能否使用理論與原則去統整案主問題的零碎資料 (Chi, Feltovich, & Glaser, 1981)。換句話說，資深諮商師善於推理問題，且善於運用其專長觀察出有意義的模式 (pattern)，並能在文化脈絡中去理解與解釋問題 (Worden & Worden, 1998)。此種能力反映出基礎知識之組織性，而新手卻易身陷於資料的表面意義中，在詮釋案主資料時，易流於膚淺甚或偏見。

不過，上述研究的情境均侷限於個別或團體諮商，至於有關諮商師如何概念

化婚姻諮商情境中的夫妻問題、處理夫妻問題中的性別角色、或是比較新手與專家層級諮商師在此情境中的差異性研究始終不多 (Ibrahim, 1985; Strohmer & Chiodo, 1984)，國內有關的研究更是付之闕如。

根據 Dryden (1999) 多年來從事婚姻與家庭諮商工作的經驗，她發現在治療室中，丈夫與妻子本人很容易將婚姻挫敗的主因指向妻子。之所以如此，與丈夫平日在關係中擁有較大的權力，及女性特質易導致丈夫情緒失控的社會論述 (discourse) 有關。因此，諮商師若對性別議題缺乏深刻之反省，很容易便認同社會對女性的論述，認為妻子應為夫妻失和負較多之責任。

在 Ivey 等人 (Ivey, Clark, & Koutstaal, 1996) 的研究中，三種不同訓練層級之諮商師在概念化夫妻的外遇問題時，對有外遇者的心理衡鑑會因其性別而有顯著之不同；在新手諮商師的眼中，不忠實丈夫的心理比不忠實妻子的心理要來的健康。而對隸屬於美國婚姻與家族治療學會 (AAMFT) 機構工作的諮商師而言，情況正好相反，他們認為不忠實妻子的心理比不忠實的丈夫健康。唯有領有證照的 AAMFT 的臨床執業會員，在看待外遇事件時才不會有性別偏見的眼光。Ivey 等人 (Ivey et al., 1996) 的研究具體顯示：新手諮商師較接近主流文化，他們對男性外遇較女性外遇有更高的包容性；而接受過進一步訓練的諮商師則較認同女性的外遇。研究者的解釋是因為訓練的關係，使得諮商師對性別更具敏感性，並為了避免貶低女性而導致偏向女性的立場。只有受過完整訓練且領有證照的臨床執業會員在看待外遇問題時，可以擺脫性別偏見之影響力。此研究一方面說明了性別偏見存在於婚姻諮商中，也說明了進階訓練與工作經驗對諮商師的重要性。

為了研究治療師的性別立場，Zygmund 與 Denton (1988) 以性冷感之夫妻為樣本，探討婚姻治療師對此婚姻難題之概念化究竟如何。研究結果發現：不同性別的治療師在概念化性困擾上有不同之表現，女性治療師較重視非發病者 (non-identified patient) 的性滿意程度，以及其理想中的性交頻率，而男性治療師則不管發病者是男性還是女性，較看重妻子理想中的性交頻率，以及丈夫的性滿意程度。研究者的結論是性別因素影響婚姻治療師的臨床診斷甚鉅。

即使多數婚姻諮商師所信守的專業態度是「中立」，且此種態度是案主夫妻評斷療效的重要依據 (Estrada & Holmes, 1999)，然而研究顯示，案主作決定的時機與方向仍受到諮商師個人價值觀的影響 (Bloch & Harari, 1996)，而諮商師的性別在其中還扮演重要之角色 (Johnson, 1976; Thomas, 1977)。

以案主是否應作離婚的決定為例，Edwards 等人的研究顯示 (Edwards, Winters, Rogers, Levingood, Ottaviano & Chambliss, 1995)：在離婚諮商上，不同性別的諮商師通常使用相似之策略，惟男性諮商師會以較積極之態度引進離婚此選項，女性諮商師則否。此點發現似乎與 Gilligan (1993) 的假設吻合，她認為男性較崇尚個別化 (individualistic) 與獨立的價值，相反的，女性較崇尚關係 (relationality)，因此，諮商師的性別便影響了其婚姻治療的方向。

Wall, Needham, Browning, 以及 James (1999) 特別取樣不同性別之家庭與婚姻治療師，比較他們在婚姻治療的情境中較重視個人還是關係的福祉，結果發現不論男性或女性治療師，他們都看重案主婚姻關係的保存與改善，而非個體的福祉。只是本研究也顯示，女性治療師不論在對保存案主夫妻的婚姻關係，還是認可離婚的態度上，都比男性治療師要來得中性。此點說明了女性治療師在治療時均較男性治療師保守，並對己身的影響力有所保留，因此也間接支持了上述 Edwards 等人 (1995) 的研究結果。

三、婚姻諮商中性別偏見的相關研究

即使心理治療界對性別偏見的研究已有超過三十年之歷史，近期也多有研究發現諮商師在接案時，對性別持有偏見之態度 (Danzinger & Welfel, 2000; Matyi & Drevenstedt, 1989; Weld, 2000)。但要從過去的研究中找到一致性的結論並不容易，Smith (1980) 以及 Whiteley (1979) 回顧整理過去有限的相關研究，結果指出，要證明心理治療情境中有性別偏見的存在，需要有更充分之證據。Sherman (1980)、Stricker 和 Shafran (1983) 更進一步指出，由過去的研究，還無法確切歸納心理治療界存有性別偏見。實際上，由於性別偏見議題本質之複雜性，研究方法上的困難，測量工具的不夠敏感，以及研究者自身的詮釋立場及偏見，均相當程度地影響過去研究的內在效度 (Fox & Murry, 2000)。

Seasan (1988) 曾取樣 192 位婦女，研究她們在接受治療時，是否感受過諮商師之性別歧視，發現多數婦女認為受到諮商師公平之對待，少數教育程度低、育有小孩的婦女，認為她們在治療中性別歧視的經驗較多。值得注意的是，這裏所謂的性別歧視均以相當幽微的方式出現，亦即諮商師沒有明顯的言詞歧視，而是在概念化案主的困難時，缺乏社會文化之視野，以及未提供案主更具成長性的處遇計劃，而上述兩點均為性別公平 (sex-fair) 治療的基本元素。

Robertson 和 Fitzgerald(1990)以 47 位領有婚姻與家族治療師執照者為受試，研究案主的性別是否會影響治療師對其症狀行為的診斷。研究結果指出：治療師對案主症狀行為的診斷與處遇均受當事人性別的影響，尤其是當男性當事人表現出非傳統男性角色時，最容易得到精神疾病之診斷。研究者因而下結論，認為諮商師的養成訓練中並未深入探討性別議題。

多年前 Bowman (1982) 就曾做過類似之研究，他取樣 61 位工作經驗多在五年以下之治療師，研究案主性別如何影響治療師對其症狀行為之診斷，結果發現治療師對在職場、人際、及性行為上均有活躍表現的女性案主持有偏見。上述兩項研究均說明治療師的臨床診斷及處遇會受到性別偏見之影響。

近年的一項研究，Seem 與 Johnson (1998) 取樣 210 位諮商研究所的學生，研究他們對婚姻諮商情境中的案主夫妻問題概念化的情形。結果發現就性別角色而言，他們較強調女性案主的傳統性別角色，而較不強調男性案主的傳統性別角色；例如，妻子較丈夫常被問到有關親職的問題，其間的性別差異性達到顯著水準。Seem 與 Johnson (1998) 據此認為諮商研究所的學生，確實需要加強訓練去除性別角色偏見，尤其是對女性在生養子女的角色態度上最需要再教育。

去年，Guanipa 和 Woolley (2000) 取樣 32 位就讀於婚姻與家庭治療研究所的研究生，其中 18 位是初學者，14 位是進階者，以夫妻的性困擾為議題，比較他們在概念化案主夫妻問題時的性別偏見。結果發現進階者在分析性別議題時較初學者純熟，不過兩組學生均很少考量文化脈絡對夫妻問題本質之影響。另一有趣的發現是已婚比未婚的學生對實驗刺激錄影帶中的丈夫負面評價較多。

比較引人注目的是 Haddock (1995) 的研究，她分析過去十年來 AAMFT 所發行的婚姻治療名師實務錄影帶，發現其中所蘊藏的性別偏見，已到了令人心生警惕的程度。今年，Zimmerman, Haddock, 和 McGeorge (2001) 針對一本全球暢銷書"Men are from Mars, Women are from Venus" (國內譯名男女大不同) 進行內容分析，發現該書大量傳遞或複製了性別不公平的狀況。

綜合上述研究，對諮商師是否普遍具有性別偏見雖難以下結論，但有些諮商情境足以突顯諮商師的性別偏見，應是可被接受之推論；此外，在精神醫學界，檢討心理衡鑑工具是否帶有性別偏見的研究也越來越多 (Garb, 1997; Hartung & Widiger, 1998; Lindsay, Sankis, & Widiger, 2000)。

而在台灣，也許出自於研究之不易，就如同歐用生所說：「意識型態的分析

非常複雜」(民 78, 第 112 頁), 目前仍未出現針對婚姻諮商情境中性別偏見的研究。倒是有研究指出, 學校中的輔導老師對學生案主普遍存有性別刻板化印象, 例如認為男性案主較女性案主獨立自主等(謝臥龍、莊勝發、駱慧文, 1997), 不過, 上述的研究很難看出其結果是因為輔導老師本身確實擁有性別刻板化印象, 還是根據其真實的諮商經驗所歸納的統合印象。因為該研究所採用的問卷量表內容並非針對實際的諮商情境發問, 因此也很難推測此種性別刻板化印象或真實經驗如何作用於諮商情境。

後現代取向的家族治療工作者比前世代的治療師更強調對自身價值、性別立場的反省(Kessler, Werner-Wilson, Cook, & Berger, 2000)。而就實務上而言, 中立客觀是接受婚姻諮商的案主夫妻對諮商師最重要且最起碼的專業要求(李文瑄, 民 89; Estrada & Holmes, 1999; Gilbert, 1987)。事實上, 婚姻治療師透過和夫妻雙方所建立的信任關係來保持平衡及展示公平, 是他的主要角色之一(陳信昭、陳碧玲, 民 89)。以女性案主為對象所做的婚姻療效研究中也發現, 諮商師除了能同理夫與妻各自的困境與需求外, 其客觀、不具性別歧視的態度也是重要的療效因素(Telford & Farrington, 1990)。諮商師若有性別偏見, 選擇性地同理某一個體, 而非婚姻關係, 會造成另一個成員的抗拒(Wilkinson, 1992); 或者諮商師過度憐憫與同情某個成員, 在無意中與夫或妻形成固定聯盟, 則不僅無法達成婚姻治療的目標, 反而加劇了案主夫妻關係之惡化, 造成夫妻重聚之困難(Bernal & Castro, 1994; Ho, 1995)。

國內諮商員的養成教育和美國最大的不同處, 在於大量培養學士層級的諮商師(引自田秀蘭、王文秀、林美珠、王麗斐, 1999, 第 205 頁), 加上國內仍未立法通過心理師法, 對從事婚姻諮商的臨床工作者, 也就無從規範其執業資格。通常只要輔導或諮商系所出身者, 皆能從事此項專業, 衡諸國內有越來越多的夫妻求助此項專業, 諮商師的服務品質也就越值得該研究領域之關注。為了一探國內諮商師在概念化夫妻問題時, 是否持有性別偏見, 以及新手與專家層級諮商師是否會因訓練的不同, 而在概念化案主問題時, 在與性別有關的議題上有不同之表現。此外, 諮商師本身的性別、婚姻狀況是否也會影響其概念化的表現, 據此, 本研究擬探討的問題如下:

- (一) 諮商師在概念化夫妻問題時, 是否有性別偏見?
- (二) 新手與專家層級諮商師概念化夫妻問題時, 在性別偏見上, 是否有差異?

(三)不同性別、婚姻狀況的諮商師，概念化夫妻問題時，在性別偏見上，是否有差異？

四、名詞界定

(一)新手諮商師：本研究中的新手諮商師，指的是已在中等學校實習接案的輔導與諮商學系的大四學生。

(二)專家層級諮商師：本研究中的專家層級諮商師，指的是曾在研究所層級接受過家族諮商或是婚姻諮商課程訓練之專業輔導人員。

(三)問題概念化：諮商師針對會談時所收集到的資料，形成對當事人問題之假設與判斷，進而發展出處遇計劃與諮商策略。

(四)性別偏見：諮商師在概念化案主夫妻問題時，偏袒、或貶抑、歧視某一性別，或具有固定性別角色分派之傾向，並因此將婚姻困難的責任歸咎給其中一方。

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總共有 58 位諮商師為本研究之研究對象，其中新手與專家層級者各佔一半，男性共有 13 位，女性有 45 位。年齡分布為 22 歲到 45 歲，29 歲以下者占 72%，30 至 39 歲者占 19%，餘 9% 屬 40 歲以上。其中 44 人為單身，13 人已婚，離婚者 1 人。專家層級者的諮商工作經驗平均為 6.24 年。所有樣本中，49% 自認為系統論者，折衷派占 10%，行為學派、理情學派則各占 7%，現實學派、完形學派、無學派者各占 5%，個人中心、敘事性療法各占 3%，阿德勒、TA、以及短期諮商各占 2%。

研究對象中的 29 位新手諮商師皆未曾在大學階段修習過婚姻以及家族諮商方面之課程，所有的專家層級諮商師則均受過研究所層級的婚姻或家族諮商訓練。

二、研究工具

(一) 諮商刺激錄影帶

本研究採取真實會談的錄影帶作為刺激情境，諮商的主題為一對夫妻因為丈夫的外遇事件引發關係困難而求助婚姻諮商，此次會談為初次諮商。本研究之所以聚焦於初次會談，是因為這是治療過程中十分重要的時機，晤談的主要議題將在此次會談中設定，並且是建立關係、評估夫妻問題、及引發案主夫妻對治療有所期許的關鍵時刻 (Alexander, 1988)，多數有關研究也均使用初次晤談的錄影帶作為情境刺激 (賀孝銘，民 88)。

一般而言，夫妻在第一次會談都相當焦慮，不知會被配偶如何鞭撻，以及諮商師又會如何罪責自己 (Worden & Worden, 1998, p. 83)。因此諮商師在初次會談時，是否帶著性別偏見的眼光概念化案主之問題，對後續的治療將產生重要的影響。

錄影帶中會談之主要內容為：妻子在三個月前發現丈夫外遇，妻子表示很難再信任丈夫，受傷甚深；丈夫希望妻子能原諒，表明自己已斬斷情絲。本研究以前二十分鐘的晤談為觀看內容，此二十分鐘多為諮商師以循環問話技術獲取夫妻雙方對其情感問題之陳述，諮商師對案主夫妻所陳述之問題並未做任何評價及處理，且不會提及任何與性別有關之詞句與內容。

此對夫妻已結婚十年，未育有子女。接案者為研究者本人，錄影帶之表面效度良好。選擇真實的婚姻諮商情境作為刺激情境是因為根據 Hawley, Bailey, 以及 Pennick (2000) 回顧從 1994 到 1998 年間的 195 篇婚姻與家族治療領域中的實證性研究報告，發現絕大多數的研究均以非臨床議題以及使用非治療情境中的案主為研究對象，外在效度因此大打折扣。此外，性別因子如果不能放在真實的婚姻故事脈絡中研究，像早期的有關研究只操弄案主或諮商師的性別變項 (Davidson & Abramowitz, 1980; Zeldow, 1984)，其結果的解釋與應用將受到很大侷限。

至於選擇外遇議題作為研究的刺激情境，在於外遇是許多夫妻求助婚姻治療專家的主因，值得諮商界更加關注 (Pittman & Wagers, 1995)。除此之外，許多婚姻諮商專家視外遇為最具婚姻破壞力之婚姻難題 (藍采風，民 75; Whisman, Dixon, & Johnson, 1997)，處理外遇事件，特別考驗婚姻諮商師之專業能力與中

立立場 (Silverstein, 1998)。最重要的是，外遇事件是相當複雜以及易涉入個人主觀價值判斷的議題，它明顯的涵蓋了情緒議題與社會文化 (social-cultural) 議題 (Peck, 1975)，諮商師如果無法知覺其是多重起因、多重面向、及與文化有關之議題，很容易便產生偏見 (Ivey, et al., 1996; McCarthy, 1999)，不僅不能為求助者提供有效之服務，反而為求助者帶來更大之困擾。

(二) 諮商師問題概念化開放式問卷

性別的意涵通常隱藏於諮商師所使用的語言、暗喻、象徵、及治療手法上，它往往透過治療關係與治療歷程才得以顯現 (Wilcox & Forrest, 1992)，因而開放式問卷是一種能取得諮商師對案主完整的想法與感受外，還能捕捉性別偏見的研究工具型式 (Seem & Johnson, 1998)。

Bowman (1982) 在研究諮商師問題概念化能力時，發展了一份開放式問卷，其內容包括：(1) 陳述案主問題成因，並猜測案主隱而未宣的議題，(2) 諮商師打算在治療過程中探索之議題，(3) 治療目標。

Robinson 和 Halliday 於 1988 年為評量婚姻治療師的概念化技巧，亦設計了一套開放式問卷，內容涵蓋以下的問題：

1. 指出夫妻所呈現的各種問題。
2. 其中最重要的問題是什麼？為何其他的問題沒有那麼重要？
3. 什麼因素導致這對夫妻會發生上述你認為重要的問題？
4. 描述你將採取的評量或治療步驟，並解釋為何你會如此做？

由 Bowman (1982) 以及 Robinson 和 Halliday (1988) 發展的開放式問卷可看出其基本內涵是一致的，均是探詢諮商師對案主問題之基本假設、治療目標、及將要採取的治療方式，其中 Robinson 和 Halliday (1988) 的問卷內容較為具體，使用情形也被評估為良好。因此本研究採用 Robinson 和 Halliday (1988) 的問卷形式，另外，為了增加瞭解研究對象在概念化案主問題時所使用的理論基礎，以做為分析研究結果之參考，研究者增加第五題：你的評量或治療步驟主要是根據哪個治療學派？這五個問題印在一張作答卷上發給研究對象，問卷上附有簡單的作答說明 (見附錄一)，作答時間為 60 分鐘。

三、研究程序

所有的研究對象，分別於三個不同的時段，在中部某國立大學的教室內觀看

上述諮商刺激錄影帶的前二十分鐘實況，而後由研究者發給研究對象「諮商師問題概念化開放式問卷」，研究對象在一小時內均能完成作答。

為確保研究過程不致產生實驗者效應，研究者在招募研究對象的過程與問卷施測的指導語上，均明確指出研究目的乃在於探討諮商師如何概念化夫妻問題，「性別偏見」或「性別」等相關詞句，均不曾提及。

四、資料分析

本研究的資料，首先由研究者與協同分析者依研究主題做抽取式的內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而後再對所取得之質性資料進行量的分析。前後計有四個階段，其過程分列如下：

(一)形成研究主題之分類架構與類別定義

研究者本人外加兩位在大學擔任輔導教師並接受過婚姻諮商、質性研究訓練之專業諮商師，擔任問卷內容之分析者，三位分析者先就每位研究對象的問卷內容進行內容分析，逐句分析問卷資料中研究主題出現的狀況與品質（Holsti, 1969），為避免遺漏問卷的資料內涵，每份問卷均逐句地反覆討論。

由於性別偏見常隱藏於幽微之文句當中，因此，三位分析者不僅針對文字本身，也反覆推敲文字的前後語句，以探究其意涵；此外，為了不讓研究對象的身份影響分析的效度，回收問卷均掩去基本資料。經討論完十二份專家層級諮商師的問卷內容後，分析者發現在「性別偏見」主題上出現更精細、穩定之七個類別，分列如下：偏袒妻子，反對妻子，偏袒丈夫，反對丈夫，性別意識，中立，社會文化意識。研究者於是在階段二的分析中，以此七個類別做為分析研究主題的分類架構，有關此七個類別的定義及說明見附錄二。

研究者特別要說明的是，在上述的分類中，七個主題類別是互斥的；以十二份研究對象的作答內容做嘗試性編碼時，均未出現作答內容被重複編碼之現象。

(二)以七個主題類別進行編碼

接下來每一位分析者就上述七個類別，對每一份問卷上的一至四題的回答獨立進行編碼，待三位分析者的一致性達.75 以上時，則由研究者獨立完成其餘的編碼工作。在完成全部 58 份的資料分析後，研究者隨機抽樣五份問卷讓協同分析者就七個類別各自編碼，而後得到一致性為.80；為了建立研究效度，研究者亦隨機抽樣三位研究對象，訪問其所填答之問卷內容是否忠實表達他們的想法，

以及研究者在七個類別上的分析是否真實反映他們在此議題上之態度，三位研究對象均無任何修正，本研究之效度因而得到支持。

之所以針對研究對象在問卷上一至四題的回答內容進行編碼，而非只針對單一問題的回答進行分析，是因為從過去之研究或本研究的實際觀察，均發現諮商師的性別偏見可發生在問題假設、認定、來源判斷、與處遇計畫任一階段當中。至於諮商師在哪一階段會出現較多或明顯之性別偏見，因非本研究之主旨，因此在下一階段之統計分析，是將研究對象在四個問題之回答內容所得到的所有編碼資料，進行量的分析。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研究者發現少數研究對象的問卷內容，出現同一類別有多次出現之現象；或甚至有研究對象在作答內容上出現不一致之性別態度。基於本研究的初探性質，以及研究者認為性別偏見出現之次數是有意義的，因此將所有出現之編碼類別，均納入統計分析。

(三)就七個主題類別出現之次數進行統計分析

針對所得的編碼資料進行量的分析，使用的統計方法包含 T 考驗、卡方檢定以及相關分析，以回答研究問題。

(四)除以統計結果回答研究問題外，並深入研究對象的問卷內容脈絡，以輔助說明研究結果

結果與討論

以下根據問卷資料的分析，說明研究問題一、問題二與問題三的研究結果，並與過去的相關研究做一比較與討論，以探討本研究的發現在相關領域中的意義。

一、諮商師在問題概念化中的性別偏見

除了瞭解諮商師在問題概念化中的性別偏見表現外，研究者也想要知道有多少諮商師出現性別偏見，因此以表一呈現所有諮商師使用七個主題類別之平均數與標準差，表二則呈現新手與專家層級諮商師使用七個主題類別的次數與人數統計。

針對諮商師對待丈夫/妻子的態度方面，從表一可看出，「偏袒妻子」出現次數最多，其次為「偏袒丈夫」、「反對丈夫」、與「反對妻子」。除了「反對妻子」之次數較少外，其他三項之次數均不在少數，反映出諮商師對錄影帶中之夫妻持有同情及反感兩種截然不同之態度。

表一
諮商師使用七個主題類別次數之平均數與標準差(N=58)

類別	次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偏袒妻子	37	0.64	1.02
反對妻子	7	0.12	0.38
偏袒丈夫	22	0.38	0.88
反對丈夫	19	0.34	0.83
性別意識	10	0.17	0.57
社會文化意識	14	0.22	0.68
中立	83	1.43	1.23

不過，透過進一步分析，可發現「偏袒」（夫或妻）的次數遠超過「反對」（夫或妻）的次數，這或許是諮商人員普遍的溫暖人格特質使然，使得研究對象表現接納、認同錄影帶中夫妻的態度多過譴責。再從另一角度觀察，偏袒妻子與反對丈夫的次數總和高過偏袒丈夫與反對妻子，顯然諮商師之情感認同較傾向於錄影帶中遭受丈夫感情背叛之妻子。對感情上弱者的同情以及對外遇事件的厭惡，可能是諮商師較偏向妻子的主要原因。

仔細分析「反對」立場的諮商師的問卷內容時，發現他們易落入傳統的性別角色刻板化期待，希望錄影帶中的夫妻能以「男強女弱」的方式，運作他們的關係。例如，批評妻子太過「強勢跋扈」才導致先生外遇，或譴責男人就是花心、不可能悔改外，更不該在處理外遇事件上表現得「不夠果斷」、「不照顧妻子情緒」、「敢做又不敢當」，此種依賴內在的性別基模（gender schemas）將某種特質投射給特定性別的情形，在過去心理學研究領域裏，可說是隨手可得（Wallston & O'Leary, 1981）。

而在婚姻諮商情境中，當諮商師試圖賦予某種價值於某一性別角色時，譬如說某一性別角色勝過另一種，或另一性別角色需修正以便向某種看齊時，其實就已跨入性別偏見之危險地帶了。本研究中有的一些諮商師出現此種因性別角色刻板化期待，而導致明顯偏向，或反對某一方的態度及處理策略。而根據過去的研究顯示，具有性別偏見的諮商師不僅傷害女性案主，男性案主也會在其刻板化的性別角色期待下發展出不適應之行為（Snyder, Velasquez, & Clark, 1997）。

進一步分析研究對象在「偏袒丈夫」與「反對妻子」類別上的內容時發現，他們多採用男性中心之立場，概念化夫妻之問題，他們認為影帶中的丈夫已有悔意，且外遇的第三者也只是歡場女子，外遇只不過是「逢場作戲」而已，因此在個案評量及治療步驟中，均為丈夫說話。也有諮商師認為丈夫外遇之原因與妻子不淑脫不了干係，而站在反對妻子的立場，並在治療步驟中加入諸如「讓丈夫告訴妻子第三者的優點，妻子才能理解丈夫的需要」的處方。此種反應支持了臨床心理學家的批評：有些治療師因過度認同父權文化而較能同情外遇丈夫的需求（Bloch & Harari, 1996；Ho, 1987；Penn, Hernandez, & Bermudez, 1997）。

「性別意識」為七個主題類別中使用次數次低者，其平均次數僅高過「反對妻子」。透過表二可發現，全體研究對象中只有六位專家層級諮商師在概念化夫妻問題時會引進性別議題，而二十九位新手諮商師則完全沒有使用性別概念。在「社會文化意識」上，全體研究對象中也只有八位專家層級諮商師使用此類別，八人當中包括前述六位使用性別類別者。

從上述的分析可看出研究對象在概念化夫妻問題時，普遍缺少從性別與文化的視野關照夫妻之衝突，其中新手諮商師更是如此。顯見即便國內學者數年前即呼籲，在諮商師的臨床訓練上應注意性別因子的影響力（郭麗安，民 84；民 87），以及在研究家庭關係中的性別議題時，應納入多元文化的觀念（趙淑珠，民 88），但諮商師在性別與文化敏感度的訓練上仍明顯不足。

因此，即使「中立」在本研究中是七個主題類別中出現次數最多的，且超過七成五的諮商師均使用此類別，仍要警惕的是，諮商師在概念化夫妻問題時，如果無法以性別與文化的視野關照夫妻之衝突，譬如，若諮商師不了解在婚姻關係中，衝突往往與權力有關（王沂釗，民 89），而權力又與性別有關（Hendrick, 1995, p. 77），諮商師的堅持中立，反而會更加複製、強化了原本在權力結構上即失衡的婚姻關係，對弱勢一方更為不公（Haddock, et al., 2000；Hare-Mustin & Marecek,

1988 ; Gilbert, 1993)。

更值得警惕的是，有少數研究對象在作答內容上出現不一致之性別偏見，例如同時出現「偏袒丈夫」與「反對丈夫」兩種類別，反應出研究對象在概念化案主夫妻問題時，己身性別態度之模糊、猶疑與相互衝突。究其原因，除了可能因同時進入兩個利益、需求衝突之當事人之內心世界，並引發深刻之同理，以致過度認同而失去專業立場外，進一步分析，亦可發現其問題概念化的品質，相較於其他性別態度中立或一致的研究對象，是較為低落的。而諮商師本身模糊甚至對立之性別態度，與其問題概念化之品質及專業訓練間的關聯性為何，實值得未來研究做進一步之探討。

二、新手與專家層級諮商師在性別偏見上的比較分析

爲了檢視、比較新手與專家層級諮商師的性別偏見，表二呈現新手與專家層級諮商師使用七個主題類別的次數與人數統計，表三呈現他們在概念化案主夫妻問題時，使用七個主題類別的差異考驗結果。

表二

新手與專家層級諮商師使用七個主題類別的次數與人數統計

類別	新手次數/使用人數	專家層級次數/使用人數
偏袒妻子	22/14	15/8
反對妻子	6/5	1/1
偏袒丈夫	17/9	5/3
反對丈夫	6/4	13/7
性別意識	0/0	10/6
社會文化意識	0/0	13/8
中立	22/18	61/26

表三
 新手與專家層級諮商師使用七個主題類別次數的差異考驗

類別主題	新手 (n=29)		專家層級 (n=29)		t 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偏袒妻子	0.76	1.02	0.52	1.02	.90
反對妻子	0.21	0.49	0.03	0.19	1.77
偏袒丈夫	0.59	1.09	0.17	0.54	1.84
反對丈夫	0.21	0.56	0.48	1.02	-1.28
性別意識	0	0	0.34	0.77	-2.42*
社會文化意識	0	0	0.45	0.91	-2.65*
中立	0.76	0.69	2.10	1.29	-4.95***

* $p < .05$ ** $p < .01$ *** $p < .001$

從表三可以看出，新手與專家層級諮商師在偏袒/反對當事人四個類別上的使用次數均無差異，但在使用「性別意識」、「社會文化意識」、與「中立」等類別的次數上，專家層級諮商師要比新手來得多。就平均數的統計考驗結果看來，專家層級諮商師在分析婚姻/外遇難題或治療策略、步驟的描述上均較新手能引入性別與社會文化議題，且更能維持中立之態度，顯示進階訓練是成功的，也與國外的臨床觀察或研究結果相符（Worden & Worden, 1998, p.9）。

上述的比較分析，是把焦點置於訓練層級不同的諮商師，在使用七個主題類別次數上的差異比較。如果以使用七個主題類別的諮商師的人數比例做為比較之焦點，則可對此兩組訓練層級不同的諮商師在性別議題上的表現有進一步之釐清作用。透過卡方檢定，新手與專家層級諮商師在使用「偏袒妻子」、「反對妻子」、「偏袒丈夫」、「反對丈夫」等類別上的人數比例並無顯著差異，在「性別意識」、「社會文化意識」、「中立」三個類別上，專家層級諮商師使用的人數比例則顯著高於新手諮商師（檢定值依次為 $X^2=4.65$, $p < .05$ ； $X^2=7.11$, $p < .01$ ； $X^2=6.03$, $p < .05$ ）。此統計結果顯示專家層級諮商師不僅在使用「性別意識」、「社會文化意識」、「中立」三個類別的次數顯著高於新手，使用的人數比例也多於新手。

不過，雖然專家層級諮商師使用性別意識的次數與人數比例顯著高於新手，

但是如前所述，其次數只集中在六個人身上。由此觀之，這種現象似乎如同 Stokowski (2000) 所感嘆的：「通常連知識份子都很難注意到性別的影響力」，因此性別在諮商師的問題概念化中似乎仍處隱形之狀態。

由於本研究的研究對象除了一位在美國取得諮商學位外，其餘皆在國內完成諮商專業訓練。而國內三所歷史最久的諮商人員訓練機構：臺灣師大、彰化師大、與高雄師大，其輔導或諮商學系及碩、博士課程中，性別研究仍多屬選修課程，因此本研究會出現這樣的結果並不令人意外。即使在美國，多年來有不少的學者呼籲，在家庭與婚姻諮商師的養成教育中，應注重性別敏感訓練 (Hoffman & Pasley, 1998; Nutt & Gottlieb, 1993)，但婚姻與家族治療師的訓練課程中，性別仍然是被忽視的元素 (Avis, 1989; Philpot, Brooks, Lusteran, & Nutt, 1997)，衡諸實務上之表現亦是如此 (Carter, 1992; Goodrich, Rampage, Ellman, & Halstead, 1988)。值得注意的是，過去的研究發現，求助夫妻通常無法體會他們之間的關係困難與性別或權力有關 (Haddock et al., 2000)。因此諮商師本人在治療過程中，也看不到「性別」的話，求助夫妻便難以從社會處方的性別角色中，發展出新的選擇 (Vatcher & Bogo, 2001)。

新手諮商師使用「社會文化意識」的情形也如同上述之「性別意識」，沒有人使用此類別。專家層級諮商師使用「社會文化意識」的次數雖比新手諮商師多，但也只集中在八人身上 (見表二)。整體而言，研究對象將性別與文化概念放進個案分析及處遇計劃中的情形並不理想，而新手諮商師更是毫無表現。

根據婚姻治療師 Low 的說法，性別差異是婚姻關係的真實結構之一 (1990, p. 266)，在家族與婚姻治療中，應被放在社會構成 (social construction) 中來理解 (Gilbert, 1993; Good, Gilbert, & Scher, 1990; Knudson-Martin, 1997)。此種觀點在二十一世紀已成為主流論述 (Johnson & Lebow, 2000; Vatcher & Bogo, 2001)，且為諮商師養成計劃中不可或缺的訓練元素 (Almeida & Durkin, 1999)。但傳統有關性別之研究則忽略社會脈絡 (social context) 及文化等變項之考量 (Riger, 1992)，而單獨抽取性別作為操弄與研究之變項，難怪諮商工作者在實務工作上，也就難以使用文化的概念詮釋案主夫妻的外遇問題。此外，從過去的研究文獻來看，婚姻治療師在處理外遇事件時，缺乏文化視野並不獨台灣為然，Penn 等人就曾批評美國治療師鮮少在文化脈絡下檢視外遇問題 (Penn, et al., 1997)。

專家層級的諮商師使用中立類別之次數顯著多過新手，究其原因，除了更精

進的專業訓練，與較豐富的實務經驗外，專家層級諮商師所服膺的治療理論與工作倫理或有所關連。在本研究中，有一成的新手諮商師自認為是屬於系統論者，而專家層級諮商師因全數受過系統療法訓練，自認屬於系統論者高達九成。在訓練過程中，此取向的治療師是被期待能保持中立，並盡量避免使用自身的優勢地位，從而操控當事人在婚姻系統中的意念與行為（Shamai, 1999；Wylie & Perrett, 1999）。

反觀新手諮商師，其接受家庭或婚姻諮商的訓練經驗甚為缺乏，且工作情境也多屬個別諮商一對一的情境，而婚姻諮商的情境是一對二，且系統論的諮商與傳統的個別諮商是屬相當不同之治療典範（陳秉華，民 89；Johnson & Lebow, 2000）。受個別諮商訓練出身的諮商師，在工作時多服膺 APA 的工作倫理守則，也就是「尊重、保存個體的尊嚴、價值、與人權」（Rosenbaum, 1982, pp.439-451）。換句話說，在諮商室中，諮商師最重視個體的價值與需求。本研究中之新手諮商師是否因個別諮商訓練之要求，因此較擅長進入單一個體的內在心理（intrapsychi），並認同其心理需求，方導致其「中立」類別出現之次數較專家層級者少？

在婚姻治療界，有越來越多的諮商師認為，有意願及有能力呵護關係才是婚姻公平與正義的基礎，因而婚姻諮商發展出有異於個別諮商的工作倫理，意即為保存家庭、婚姻體系，個體需求應做適度的調整（Wall, et al., 1999）。因此，若家庭成員的需求或行為對家人會造成傷害的話，婚姻諮商師無需貫徹「尊重、保存個體的尊嚴、價值、與人權」的個別諮商倫理。至於如此相異的工作倫理與訓練經驗，是否才導致專業層級諮商師在夫妻的衝突中，可以維持較中立之姿態？這值得作進一步之研究。

去年，在 Hamly 以及 Geshe（2000）的回顧性研究中，發現 95 篇發表過的家族治療研究中，以系統論自居者為最多，女性主義者次之，此兩種治療取向會成為較受歡迎之治療模式，與治療師在治療情境時，採取性別中立或性別公平的態度是否有所關連？亦值得探究。

三、七個主題類別與諮商師工作年資間的相關分析

除了主要的研究問題外，研究者亦想分析七個主題類別之間，以及其與工作年資間的相關為何。表四為七個主題類別間的相關係數摘要表。

從表四可看出「偏袒妻子」與「反對丈夫」、「中立」的相關達顯著水準；「反對妻子」與「偏袒丈夫」的相關達顯著水準；「社會文化意識」與「反對丈夫」、「性別意識」、「工作年資」的相關達顯著水準；「性別意識」與「反對丈夫」及「工作年資」的相關達顯著水準；「中立」與「工作年資」的相關達顯著水準。

從上述的相關結果看來，似乎越偏袒妻子者則越反對丈夫，相對的，越偏袒丈夫者則越反對妻子。這符合人類情感的自然傾向，顯見研究對象對當事人夫妻之情感相當一致。此外，工作年資越長者，他們的性別與社會文化意識越敏感，態度越中立。因此可以說明工作經驗對提高諮商師的中立態度與性別、社會文化意識是有助益的。值得注意的是，越具性別與社會文化意識的諮商師越傾向反對丈夫。顯示國內諮商師的性別與文化訓練，有可能仍處在挑戰父權文化之階段，這使得諮商師無法將外遇之丈夫亦視為傳統性別文化脈絡下之「發病者」(identified patient)，對接受婚姻諮商之丈夫也可能是不公平的。

表四

七個主題類別之間與諮商師工作年資間的相關摘要表

	偏袒妻子	反對妻子	偏袒丈夫	反對丈夫	性別意識	社會文化意識	中立	工作年資
偏袒妻子	-----							
反對妻子	-.02	-----						
偏袒丈夫	.16	.28*	-----					
反對丈夫	.30*	-.02	.01	-----				
性別意識	.11	-.10	-.06	.39**	-----			
社會文化意識	.15	-.11	-.03	.33**	.86***	-----		
中立	-.25*	-.15	-.12	.04	.02	.09	-----	
工作年資	-.15	-.17	-.18	.15	.58***	.46***	.27*	-----

* $p < .05$ ** $p < .01$ *** $p < .001$

四、不同性別諮商師在性別偏見上的比較分析

本研究的樣本人數固然不多，在做差異性檢定時其統計力 (power) 可能太

小。然本研究屬探索性質，爲了研究的目的，仍執行了性別與婚姻狀況的統計檢定。就性別部分，本研究的男性諮商師共有 13 人，比起女性的研究對象人數雖然嫌少，但其實反映出諮商行業在東西方均已逐漸變成女性的行業（women's profession）（McGoldrick, Almeida, Preto, & Bibb, 1999）。

表五
不同性別諮商師使用七個主題類別次數的差異考驗

類別主題	男性 (n=13)		女性 (n=45)		t 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偏袒妻子	.77	1.24	.60	.96	.52
反對妻子	.15	.38	.11	.38	.36
偏袒丈夫	.46	.88	.36	.88	.38
反對丈夫	.15	.38	.40	.92	-1.43
性別意識	.15	.56	.18	.58	-.13
社會文化意識	.23	.60	.22	.70	.04
中立	1.31	1.03	1.47	1.29	-.41

從表五可發現不同性別的諮商師在使用七個主題類別的次數上並無顯著的差異，透過卡方檢定，男性諮商師與女性諮商師在使用七個主題類別的人數比例上亦無顯著差異，此結果與 Zygmond 和 Denton (1988)，Gass 及 Nichols (1988) 的研究結論略有不同。

在 Gass 及 Nichols (1988) 的研究中，他們以男性婚姻諮商師與因丈夫外遇而求助的夫妻爲研究對象，發現丈夫及男性婚姻諮商師在會談中會曲解 (mislabeling) 妻子的反應，且以性別刻板化的態度對待妻子，造成妻子在治療後更形沮喪。而本研究顯示，在「反對妻子」的類別次數上，不同性別的諮商師之間並無顯著差異。

在 McGoldrick 等人主持之紐澤西家庭治療機構 (Family Institute of New Jersey) 的治療師訓練計畫中發現 (McGoldrick, et al., 1999)，計畫中最艱難之任務是要男性治療師討論性別公平的議題，同樣的，要男性治療師將性別視爲家族治

治療過程中的主題，也會讓他們不自在。不過本研究發現，在將性別與文化意識融入婚姻問題概念化中，不同性別之諮商師間並無明顯之差異。

在韓國，他們的諮商經驗顯示，若由男性諮商師為團體帶領人，組織家庭暴力男性加害者心理治療團體，將無法產生療效。因為由男性帶領男性處理同性的非行行為，是牴觸其文化，且冒犯男性尊嚴的做法 (McGoldrick, et al., 1999)。而本研究中的男性諮商師，不管在偏袒或反對當事人夫妻的四個類別次數上，與女性諮商師相較，均無顯著差異，是否意味著台灣男性諮商師比起上述國家的男性諮商師，較具性別平等意識？有待更多相關研究之探討。

五、未婚與已婚諮商師在性別偏見上的比較分析

除一位離婚者外，研究對象中有 44 位屬未婚組，13 位屬已婚組，其中含一位丈夫過世者。其統計考驗結果見表六。

從表六可看出，已婚諮商師使用「中立」類別的次數較未婚諮商師多，而未婚諮商師出現在「偏袒妻子」、「反對妻子」、及「偏袒丈夫」的類別次數上，均較已婚諮商師多。

根據 Guanipa 和 Woolley (2000) 的研究發現，已婚諮商師比未婚者在諮商情境中對丈夫持較多負面偏見，在本研究中並未得到支持，但從研究對象的組成結構中，發現已婚者全屬專家層級諮商師（新手全是未婚者），這種現象是否說明已婚諮商師在處理婚姻議題時，他們的婚姻經驗使他們能更客觀且多元地概念化當事人之問題，還是已婚諮商師較資深且又受過進階訓練，才導致如此之結果，仍須進一步探討。

表六

未婚與已婚諮商師使用七個主題類別的差異考驗

類別主題	未婚 (n=44)		已婚 (n=13)		t 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偏袒妻子	.75	1.10	.23	.60	2.21*
反對妻子	.16	.43	0	0	2.46*
偏袒丈夫	.48	.98	.08	.28	2.41*

反對丈夫	.30	.80	.38	.87	-.35
性別意識	.02	.15	.54	.97	-1.92
社會文化意識	.09	.36	.62	1.19	-1.56
中立	1.23	1.05	2.15	1.57	-2.47*

* $p < .05$

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諮商師在婚姻諮商情境中問題概念化的性別偏見，根據 58 名諮商師在觀賞過婚姻諮商實況錄影帶後所填答之問題概念化問卷，說明諮商師的性別偏見情形，並比較不同訓練層級、性別、與婚姻狀況的諮商師間的差異。研究的主要發現為：

(一)在性別偏見主題上出現七個精細、穩定的類別：「偏袒妻子」、「反對妻子」、「偏袒丈夫」、「反對丈夫」、「性別意識」、「社會文化意識」、與「中立」。

(二)七個主題類別中，諮商師出現「中立」的次數最多，其他依次為「偏袒妻子」、「偏袒丈夫」、「反對丈夫」、「社會文化意識」、「性別意識」與「反對妻子」。

(三)新手諮商師中無人能在夫妻問題概念化時，納入性別與社會文化意識，專家層級諮商師使用「性別意識」與「社會文化意識」類別的次數雖比新手諮商師多，但也只集中在少數人身上。基本而言，這兩組諮商師在個案分析及處遇計劃中，運用性別與文化意識的情形均不算理想，而新手諮商師更是毫無表現。

(四)新手與專家層級諮商師在使用偏袒/反對當事人夫妻四個類別的次數上均無顯著差異，專家層級諮商師在使用「性別意識」、「社會文化意識」、與「中立」等類別的次數上，顯著比新手多。

(五)就七個主題類別間及其與工作年資的相關分析發現，「偏袒妻子」與「反對丈夫」、「中立」的相關達顯著水準；「反對妻子」與「偏袒丈夫」的相關達顯著水準；「社會文化意識」與「反對丈夫」、「性別意識」、「工作年資」的相關達顯著水準；「性別意識」與「反對丈夫」及「工作年資」的相關達顯著水準；「中立」與「工作年資」的相關達顯著水準。整體觀之，「工作年資」與「性別意識」、

「社會文化意識」、「中立」等類別均呈顯著正相關，顯見工作經驗對諮商師專業成長之助益。值得注意的是，「性別意識」、「社會文化意識」與「反對丈夫」三個類別相互之間亦呈現顯著正相關，因而有可能說明國內諮商師的性別與文化訓練仍處在挑戰父權文化之階段，對接受婚姻諮商的外遇男性可能也形成另一種不公平。

(六)不同性別的諮商師在使用七個主題類別的次數上，並無顯著差異。

(七)已婚諮商師較未婚諮商師使用較多的「中立」類別，而未婚諮商師在「偏袒妻子」、「反對妻子」、及「偏袒丈夫」等類別上，使用的次數則較已婚諮商師多。

二、研究限制

(一)研究工具雖然使用真實的案主與真實的會談情境，然而本研究所採用的紙筆測驗是否足以代表真實會談情境中諮商師的表現，是值得探討的。此外，所有的研究對象針對一捲錄影帶的前二十分鐘晤談做反應，在不同議題的婚姻諮商情境中，他們是否仍有相同之反應，不宜做過度之推論。

(二)研究對象的性別分配，雖足以反映國內從事諮商專業工作的性別比例，但男性諮商師人數仍顯不足；在婚姻狀況部分，已婚者之比例亦相對性較少。在做性別與婚姻推論時，宜加謹慎。此外，本研究之研究對象全來自中部，在做推論時，或許應考量地域上之限制。

(三)重複使用差異性檢定統計使得犯第一類型錯誤 (type I error) 的機會增加，影響外在效度。

三、建議

綜合本研究之主要發現，研究者針對國內諮商師的性別訓練、未來研究方向、及選擇婚姻諮商師要領等三方面提出建議。

(一)諮商師的性別訓練

鑒於本研究中的諮商師在概念化夫妻問題時，缺少以性別與文化的視野關照夫妻之衝突，研究者認為，在國內的婚姻與家族諮商學程中，應將性別訓練納入所有學科領域之內，將之視為學程中之核心學習，並形成統整形式 (integrated format)，而非只以幾門有關性別的選修科目點綴其中。

由於性別公平諮商 (sex-fair counseling) 的學習與實踐，並非光靠理念之講述即可獲得，訓練者應提供充分的諮商實例與技術示範，讓學習者在認知上樂意公平對待不同性別之案主，且有能力在諮商情境中實踐之。

此外，由於本研究顯示，越具性別與社會文化意識的諮商師越傾向反對丈夫，因此，訓練者宜應警惕，勿將性別與文化訓練置於反動男性傳統角色、挑戰父權之層次上，如此不僅對接受婚姻諮商之丈夫形成另一種壓迫，對案主夫妻發展新的角色與學習亦無助益。為避免產生上述窘境，訓練者應熟稔兩性的社會化歷程，了解兩性在文化脈絡中的歷史處境，對兩性同處在性別僵化桎梏中之處境應賦予同等之關懷。

諮商新手若從事婚姻諮商，宜在有督導的情況下進行，以確保案主夫妻得到公平之對待。

(二)未來研究方向

建議未來研究多運用各種家庭議題的婚姻諮商情境，探討不同背景的諮商師在性別偏見上的表現。尤其可以針對台灣男性諮商師的性別立場，做跨文化之探討與比較，將可對台灣男性諮商師的平權意識水準有更進一步之瞭解；此外，婚姻經驗對諮商師性別立場之影響，亦為值得繼續探索之議題。

而本研究在性別偏見上所出現的七個主題類別，在不同議題之婚姻諮商情境是否均會穩定地出現，同樣值得進一步之研究。

(三)選擇婚姻諮商師的要領

鑒於國內仍未建立婚姻諮商師之證照制度，民眾若需要婚姻諮商協助，諮商師的工作經驗與研究所層級的專業訓練背景，可作為選擇的兩個重要指標。

針對本文之任何回應、回饋或意見，請直接聯繫：郭麗安，彰化市進德路 1 號，04-7232105 轉 2119，lakuo@cc.ncue.edu.tw。



參考文獻

- 王沂釗 (民 89)。婚姻衝突的敘說性研究。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博士論文。
- 田秀蘭、王文秀、林美珠、王麗斐 (1999)。學校諮商師之訓練—困境、契機、與展望。載於中國輔導學會 (編) 輔導學大趨勢。台北：心理出版社，189-220。
- 李文瑄 (民 89)。客體關係婚姻治療 (八)：理論基礎剖析。諮商與輔導，176，29-32。
- 陳秉華 (民 89)。短期心理治療的誕生與發展—兼論心理治療學派典範的轉移。中華輔導學報，9，169-197。
- 陳信昭、陳碧玲 (民 89)。婚姻治療—有效的技術與取向。台北：五南。
- 郭麗安 (民 84)。性別與輔導。輔導季刊，31 (4)，37-42 頁。
- 郭麗安 (民 87)。諮商實務中的平權觀念。輔導季刊，31 (2)，31-34 頁。
- 賀孝銘 (民 88)。在學準諮商員之「個案概念化」與其相關因素研究。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博士論文。
- 趙淑珠 (民 88)。家庭系統中之性別議題。應用心理學研究，2，123-138。
- 歐用生 (民 78)。質的研究。台北：師大書苑。
- 藍采風 (民 75)。婚姻關係與適應。台北：張老師出版社。
- 謝臥龍、莊勝發、駱慧文 (民 88)。各級學校諮商員對女性案主性別角色與特質認知之比較研究。諮商輔導文粹，1，13-40。
- Alexander, J. E. (1988). Phase of family therapy: A framework for clinicians and researchers. In L. C. Wynne (Ed.), *The state of the art in family therapy research: Controversies and recommendations* (pp.175-187). New York: Family Process Press.
- Almeida, R., & Durkin, I. (1999). The cultural context model: Therapy for couples with domestic violence. *Journal of Marital and Family Therapy*, 25, 313-324.
- Aneshensel, C. S., & Pearlin, L. I. (1987). Structural contexts of sex differences in stress. In R. C. Barnett, L. Biener, & G. K. Baruch (Eds.), *Gender and stress*

- (pp.100-121).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Avis, J. M. (1989). Integrating gender into the family therapy curriculum. *Journal of Feminist Family Therapy, 1*(2), 3-26.
- Basow, S. A. (1992). *Gender: Stereotypes and roles* (3 rd ed.). Pacific Grove, CA: Brooks/Cole.
- Bereiter, C., & Scardamalia, M. (1987). Educational relevance of the study of expertise. Special issues: Illuminating education. *Interchange, 17*(2), 10-19.
- Bernal, M., & Castro, F. (1994). Are clinical psychologist prepared for service and research with ethnic minorities? *American Psychologist, 49*(9), 794-805.
- Bloch, S., & Harari, E. (1996). Working with the family: The role of values.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therapy, 50*(3), 274-285.
- Bowman, P. (1982). An analog study with beginning therapists suggesting bias against "activity" in women. *Psychotherapy: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19*, 318-324.
- Broverman, I. K., Broverman, D. M., Clarkson, F. E., Rosenkrantz, P. S., & Vogel, S. (1970). Sex-role stereotypes and clinical judgements of mental health.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34*, 1-7.
- Burke, C., & Daniel, G. (1995). *Gender and family therapy*. London: Haworth.
- Carter, B. (1992). Stonewalling feminism. *Family Therapy Networker, 16*, 64-69.
- Chi, M., Feltovich, P., & Glaser, P. (1981). Categorization and representation of physic problems by experts and novices. *Cognitive Sciences, 5*, 121-152.
- Conway, K. L., & Krumboltz, J. D. (1998). Sensitivity to marital difficulties. *The Family Journal: Counseling and Therapy for Couples and Families, 5*(2), 120-124.
- Cook, E. P. (1990). Gender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Journal of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68*, 371-375.
- Corey, G. (1996).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Pacific Grove, CA: Brooks/Cole.
- Daniluk, J. C., Stein, M., & Bockus, D. (1995). The ethics of inclusion: Gender as a critical component of counselor training. *Counselor Education and Supervi-*

- sion*, 34, 294-307.
- Danzinger, P. R., & Welfel, E. R. (2000). Age, gender and health bias in counselors: An empirical analysis.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Counseling*, 22(2), 135-149.
- Davidson, C. B., & Abramowitz, S. I. (1980). Sex bias in clinical judgement: Later empirical returns.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4, 377-395.
- Dressel, P., & Clark, A. (1990). A critical look at family car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2, 769-782.
- Dryden, J. (1999). *Being married, doing gender*. London: Routledge.
- Edwards, E., Winters, S., Rogers, L., Levingood, J., Ottaviano, K., & Chambliss, C. (1995).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rapists' gender and attitudes toward divorce and marital therapy intervention preferences*. EDRS: Microfiche.
- Estrada, A. U., & Holmes, J. M. (1999). Couples' perceptions of effective and ineffective ingredients of marital therapy. *Journal of Sex & Marital Therapy*, 25, 151-162.
- Ettenson, R., Shanteau, J., & Krogstad, J. (1987). Expert judgment: Is more information better? *Psychological Report*, 60(1), 227-238.
- Fox, G. L., & Murry, V. M. (2000). Gender and families : Feminist perspectives and family research.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62(4), 1160-1172.
- Garb, H. N. (1997). Race bias, social class bias, and gender bias in clinical judgment. *Clinical Psychology: Science and Practice*, 4, 99-120.
- Gass, G. Z., & Nichols, W. C. (1988). Gaslighting: A marital syndrome. *Contemporary Family Therapy*, 10(1), 3-16.
- Gilbert, L. A. (1987). Women and men together but equal: Issues for men in dual-career marriages. In M. Scher (Ed.), *Handbook of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with men* (pp.278-294). Beverly Hills, CA: Sage.
- Gilbert, L. A. (1993). *Two careers/one family: The promise of gender equality*. Thousand Oaks, CA: Sage.
- Gilligan, C. (1993). *In a different voice: 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women's developm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illigan, C., Lyons, N., & Hamner, I.(1989). *Making connections: the relational*

- worlds of adolescent girls at Emma Willard School*.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old, J. M. (1997). Gender and marital intimacy. *The Family Journal: Counseling and Therapy for couples and Families*, 5(3), 199-203.
- Good, G. E., Gilbert, L. A., & Scher, M. (1990). Gender aware therapy: A synthesis of feminist therapy and knowledge about gender. *Journal of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68, 376-380.
- Goodrich, T. J., Rampage, C., Ellman, B., & Halstead, K. (1988). *Feminist family therapy: A casebook*. New York: Norton.
- Gray, C. (1995). Divorce or a room of your own: Options for troubled marriages. *Family Therapy*, 22, 143-156.
- Guanipa, C. W., & Woolley, S. R. (2000). Gender biases and therapists' conceptualization of couple difficul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28(2), 181-192.
- Haddock, S. A. (1995). *A content analysis of AAMFT Master Series tapes: A feminist perspective*.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Fort Collins.
- Haddock, S. A., Zimmerman, T. S., & Macphee, D. (2000). The power equity guide: Attending to gender in family therapy.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Therapy*, 26(2), 153-170.
- Hamly, D. R., & Geshe, S. (2000). The use of theory in family therapy research: A content analysis of family therapy journal. *Journal of Marital and Family Therapy*, 26(1), 17-22.
- Hare-Mustin, R. T. (1987). The problem of gender in family therapy theory. *Family Process*, 26, 15-33.
- Hare-Mustin, R. T., & Marecek, J. (1988). The meaning of difference: Gender theory, post-modernism, and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43, 455-464.
- Hartung, C. M., & Widiger, T. A. (1998).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diagnosis of mental disorders: Conclusions and controversies of DSM-IV.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3, 260-278.

- Hawley, D. R., Bailey, C. E., & Pennick, K. A. (2000). A content analysis of research in family therapy journal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Counseling, 26*(1), 9-16.
- Hawley, D. R., & Geske, S. (2000). The use of theory in family therapy research: A content analysis of family therapy journal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Counseling, 26*(1), 17-22.
- Hendrick, S. S. (1995). *Close relationships: What couple therapists can learn*. CA: Brooks/Cole.
- Ho, D. (1995). Internalized culture, culture-centrism, and transcendence. *The Counseling Psychology, 23*(1), 4-24.
- Ho, M. K. (1987). Family therapy with ethnic minorities. In A. Lauffer & C. Garvin (Eds.), *Family therapy with ethnic minorities* (pp. 24-68). Newbury Park, CA: Sage.
- Hoffman, L. (1993). *Exchanging voices: A collaborative approach to family therapy*. London: Karnac.
- Hoffman, R. M., & Pasley, K. (1998). Thinking about the sexes: The relation between cognitions and gender stereotype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26*(3), 189-202.
- Holsti, O. R. (1969). *Content analysis for the social science and humanities*. MA: Addison-Wesley.
- Ibrahim, F (1985). Preparation of counselors in Pakistan: A proposed mode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ancement of Counselors, 8*(4), 323-327.
- Ivey, D. C., Clark, W. M., & Koutstaal, S. (1996). *The role of gender and training in perceptions of infidelity*. EDRS: Microfich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04th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in Toronto(8/11).
- James, K., & McIntyre, D. (1983). The reproduction of families: The social role of family therapy? *Journal of Marital and Family Therapy, 9*(2), 119-129.
- Johnson, M.(1976). An approach to feminist therapy. *Psychotherapy: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13*, 72-76.
- Johnson, S., & Lebow, J. (2000). The 'coming of age' of couple therapy: A decade re-

- view. *Journal of Marital and Family Therapy*, 26(1), 23-38.
- Jones, E. (1994). The construction of gender in family therapy. In C. Burke and B. Speed (eds.), *Gender, power and relationships*. London: Routledge.
- Kessler, M. R. H., Werner-Wilson, R. J., Cook, A. S., & Berger, C. P. (2000). Emotion management of marriage and family therapists: How is it different for women and me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28(3), 243-253.
- Knudson-Martin, C. (1997). The politics of gender in family therapy. *Journal of Marital and Family Therapy*, 23(4), 421-437.
- Knudson-Martin, C. & Mahoney, A. R. (1996). Gender dilemmas and myth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arital bargain issues for marital therapy. *Family Process*, 35, 137-153.
- Lindsay, K. A., Sankis, L. M., & Widiger, T. A. (2000). Gender bias in self-report personality disorder inventori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Disorders*, 14(3), 218-232.
- Low, N. S. (1990). Women in couples: How their experience of relationships differs from men's. In R. Chasin, H. Grunebaum, & M. Herzog, (Eds.), *One couple, four realities: Multiple perspectives on couple therapy* (pp. 249-268). NY: The Guilford Press.
- Luepnitz, D. A. (1989). Virginia Satir: The limitations of humanism. *Journal of Feminist Family Therapy*, 1(3), 73-83.
- Markman, H. J., & Kraft, S. A. (1989). Men and women in marriage: Dealing with gender differences in marital therapy. *The Behavior Therapist*, 12, 51-56.
- Matsui, W. (1988). The process of structural family therapy: Level of experience makes a difference. *Family Therapy Collection*, 24, 1-20.
- Matyi, C. L., & Drevenstedt, J. (1989). Judgments of elderly and young clients as functions of gender and interview behaviors: Implications for counselors.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36, 451-455.
- McCarthy, B. W. (1999). The nonsexual marriage: Assessing viability and treatment options. *Journal of Sex and Marital Therapy*, 25, 227-236.
- McGoldrick, M., Almeida, R., Preto, N. G., & Bibb, A. (1999). Efforts to incorporate

- social justice perspectives into a family training program. *Journal of Marital and Family Therapy*, 25(2), 191-209.
- McHale, E., & Carr, A. (1998). The effect of supervisor and trainee therapist gender on supervision discourse.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20, 395-411.
- Newberry, A. M., Alexander, J. E., & Turner, C. W.(1991). Gender as a process variable in family therapy.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5(2), 158-175.
- Notarius, C. L., & Pelligrini, D. S. (1987). Differences between husbands and wives: Implications for understanding marital discord. In K. Hahlweg & M. Goldstein (Eds.), *Understanding major mental disorder: The contribution of family interaction research*. New York: Family Process.
- Nutt, R., & Gottlieb, M. (1993). Gender diversity in clinical psychology: Research, practice, and training. *The Clinical Psychologist*, 46, 64-73.
- Peck, B. B. (1975). Therapeutic handling of marital infidelity. *Journal of Family Counseling*, 3(2), 52-58.
- Penn, C. D., Hernandez, S. L., & Bermudez, J. M. (1997). Using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to understand infidelity in couple therapy. *American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25(2), 169-185.
- Philpot, C. L., Brooks, G. R., Lusterman, D., & Nutt, R. L.(1997). *Bridging separate gender worlds*.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Pittman, F. S., & Wagers, T. P.(1995). Crises of infidelity. In N. S. Jacobson & Gurman, A. S. (Eds.), *Clinical handbook of couple therapy*.(pp.295-316).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Polefrone, J. M. & Manuck, S. B. (1987). Gender differences in cardiovascular and neuroendocrine response to stressors. In R. C. Barnett, L. Biener, & G. K. Baruch (Eds.), *Gender and stress* (pp.13-38).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Riger, S. (1992). Epistemological debates, feminist voices: Science, social values, and the study of women. *American Psychologist*, 47, 730-740.
- Robertson, J., & Fitzgerald, L. R. (1990). The (mis)treatment of men: Effects of client gender-role and life style on diagnosis and attribution of pathology.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37, 3-9.

- Robinson, V., & Halliday, J. (1988). Relationship of counseling reasoning and data collection to problem-analysis quality. *British Journal of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16*(1), 50-62.
- Rosenbaum, M. (1982). *Ethics and values in psychotherapy: A guidebook*.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Seaman, R. (1988). Sex bias and sex-role stereotyping in psychotherapy with women: Survey results. *Psychotherapy, 25*, 107-116.
- Seem, S., & Johnson, E. (1998). Gender bias among counselor trainee: A study of a case conceptualization. *Counselor, Education and Supervision, 33*, 139-147.
- Shamai, M. (1999). Beyond neutrality-a politically oriented systemic intervention.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21*, 217-229.
- Sherman, J. (1980). Therapist attitudes and sex-role stereotyping. In A. Brodsky and R. Hare-Mustin (Eds.), *Women and psychotherapy: An assessment of research and practice* (pp. 35-66).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Silverstein, J. L. (1998). Countertransference in marital therapy for infidelity. *Journal of Sex and Marital Therapy, 24*(4), 293-301.
- Smith, M. (1993). Ethnicity and training marital and family therapists. *Counselor, Education & Supervision, 33*, 139-147.
- Smith, M. L. (1980). Sex bias in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Psychological Bulletin, 7*, 392-407.
- Snyder, D. K., Velasquez, J. M., & Clark, B. L. (1997). Parental influence on gender and marital role attitudes: Implications for intervention. *Journal of Marital and Family Therapy, 23*, 191-201.
- Stokowski, P. A. (2000). Exploring gender. *Journal of Leisure Research, 32*(1), 161-165.
- Stricker, G., Shafran, R. (1983). Gender and psychotherapy: A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literature. In J. Murray and P. R. Abramson (Eds.), *Bias in psychotherapy* (pp. 192-214). New York: Praeger.
- Strohmer, D. C., & Chiodo, A. L. (1984). Counselor hypothesis-testing strategies: The role of initial impressions and self-schema.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31*, 1-10.

- 31, 510-519.
- Sue, D. W., Ivey, A., & Pederson, P. (1996). *A theory of multicultural counseling and therapy*. Pacific Grove, CA: Brooks/Cole.
- Telford, A., & Farrington, A. (1990). Gender issues in couple therapy. In D. Hooper, & Dryden, W. (Eds.), *Couple therapy: A handbook* (pp. 165-178). Phil.: Open University Press.
- Thomas, S. A. (1977). Theory and practice in feminist therapy. *Social Work, 22*, 447-454.
- Vatcher, C. A., & Bogo, M. (2001). The feminist/emotionally focused therapy practice model: An integrated approach for couple therapy. *Journal of Marital and Family Therapy, 27*(1), 69-83.
- Wall, J., Needham, T., Browning, D., & James, S. (1999). The ethics of relationality: The moral views of therapists engaged in marital and family therapy. *Family Relations: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 Applied Family Studies, 48*(2), 139-149.
- Wallston, B. S., & O'Leary, V. E. (1981). Sex makes a difference: Differential perceptions of women and men. *Review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 9-41.
- Weld, E. C. (2000). The influence of implicit gender bias in clinical judgement. *Dissertation Abstract: 2000-95006-157*.
- Werner-Wilson, R. J. (1997). Is therapeutic alliance influenced by gender in marriage and family therapy? *Journal of Feminist Family Therapy, 9*, 3-16.
- Werner-Wilson, R. J., Zimmerman, T. S., & Price, S. J. (1999). Are goals and topics influenced by gender and modality in the initial marriage and family therapy session? *Journal of Marital and Family Therapy, 25*(2), 253-262.
- Whisman, M. A., Dixon, A. E., & Johnson, B. (1997). Therapists' perspectives of couple problems and treatment issues in couple therapy.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11*(3), 361-366.
- Whiteley, B. (1979). Sex roles and psychotherapy: A current appraisal. *Psychological Bulletin, 86*, 1309-1321.

- Wiedenbeck, S. (1985). Novice/expert differences in programming skill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Machine Studies*, 23(4), 383-390.
- Wilcox, D. W., & Forrest, L. (1992). The problems of men and counseling: Gender bias or gender truth?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Counseling*, 14(3), 291-304.
- Wilkinson, M. (1992). How do we understand empathy systemically?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14(2), 193-205.
- Worden, M., & Worden, B. D. (1998). *The gender dance in couple therapy*. Pacific Grove: Brooks/Cole.
- Wylie, K., & Perrett, A. (1999). Ethical issues in work with couples. *Sexual and Marital Therapy*, 14(3), 219-233.
- Zeldow, P. B. (1984). Sex roles,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and patient management. In C. S. Widom (Ed.), *Sex roles with psychopathology* (pp. 355-374). New York: Plenum.
- Zimmerman, T. S., Haddock, S. A., & McGeorge, C. R. (2001). Mars and Venus: Unequal planets. *Journal of Marital and Family Therapy*, 27(1), 55-68.
- Zygmund, M. J., & Denton, W. (1988). Gender bias in marital therapy: A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16(3), 262-272.



附錄一

諮商師問題概念化開放式問卷

本問卷是想要瞭解您對影片中夫妻關係之想法，請自由作答，不限字數，但請在 60 分鐘以內作答完畢。爲了分析需要，並請填答一些基本資料，謝謝。

您的性別是：1.男性_____ 2.女性_____

您從事輔導工作共有_____年

您是否已婚：1.是____；結婚_____年 2.未____ 3.已離婚____

您所服務之單位屬：1.大學（專）院校____ 2.中等學校____ 3.小學____

4.社區機構____ 5.全職學生____

您的年齡：1.29 歲以下____ 2.30 至 39 歲____ 3.40 至 49 歲____ 4.50 歲以上____

學歷：1.學士層級____ 2.碩士層級____ 3.博士層級____

- 1.指出影片中夫妻所呈現的各種問題，
- 2.您認爲其中最重要的問題是什麼？其他的問題爲何沒有那麼重要？
- 3.什麼因素導致這對夫妻會發生上述您認爲重要的問題？
- 4.請概略描述您將採取的評量或治療步驟，並解釋爲何您會如此做。
- 5.您的評量或治療步驟主要是根據哪個治療學派？（譬如系統學派、女性主義治療學派、敘事性治療學派、個人中心治療學派、理情治療學派、行爲治療學派、完形治療學派、阿德勒治療學派、折衷學派.....）請寫出該學派名稱即可。



附錄二

類別歸類標準及說明

一、性別意識：諮商師在概念化案主夫妻問題時能涵蓋性別議題；例如以性別差異的角度解釋夫妻的關係困難，「男性不善表達愛意，但妻子需要先生親密」；以性別角度詮釋男性外遇被發現後之行爲反應的意涵，「在這個社會中，男性會認爲自尊對男人很重要，所以做錯事還是希望別人不要讓他太難堪」；以性別角度詮釋錄影帶中妻子發現先生外遇之情緒與行爲反應，「女性在關係中喪失了獨立自主權，只有用哭泣恐嚇方式處理背叛」；以性別解構夫妻間的不平等結構及不對等關係，「丈夫/男性負責養家，握有情感的掌控權」等均被視爲具有性別意識。

二、偏袒妻子：完全站在妻子立場，爲妻子說話；例如「應該重建妻子/女性信心，思考這種丈夫/男性還值不值得努力」、「妻子/女人就是讓丈夫/男人認爲她跟定了他，才會被他吃的死死的」、「讓丈夫珍惜妻子對他的愛，與了解妻子所受的傷害，不能讓丈夫一直傷她的心」、「建立妻子在丈夫心目中的地位及價值感，讓丈夫知道失去妻子對他一點好處都沒有」、「太太/女性雖然站在指責的位置，實際上她是個受害者」、「列出所有太太希望先生所採取的行動，並讓先生去做以證明他愛她」、「丈夫/男性必須要拿出誠意付出行動」等均被視爲偏袒妻子。

三、反對妻子：對妻子持有負面評價；例如「她/女性以責罵圍堵的方式使得先生/男性認爲家庭沒有吸引力」、「太太/女性面對競爭者自卑，控制先生/男性以維持關係」、「太太自卑，擔心自己離婚後沒人愛才要挽回丈夫的心」、「太太/女性掌控欲強，先生/男性受不了才用外遇來逃避壓力」、「太太/女性強勢跋扈，先生/男性無法和她相處」等均被視爲反對妻子。

四、偏袒丈夫：完全站在丈夫立場，爲丈夫說話；例如「妻子用冷漠傷害的方式使得先生用外遇來解決他對婚姻的倦怠」、「丈夫比較愛妻子，但熱情得不到回應才外遇」、「要丈夫說出外遇對象吸引他的原因，而哪些是在妻子身上看不到的，讓妻子喚起過去之激情」、「先生的情感需求在家裡得不到滿足」、「丈夫被妻子的冷漠傷害，外遇是他的解決之道」、「老婆時常扮演強勢的位置，其 P 的狀態污染其他部分，讓老公無法忍受」、「先生/男性無法從老婆/女性身上得到他想要

的愛或其他才會尋求外遇」、「老婆/女性不斷猜忌讓老公/男性備感壓力」等均被視為偏袒丈夫。

五、反對丈夫：對丈夫持有負面評價；例如「男人就是花心」、「男人有了錢容易作怪」、「丈夫吃定老婆為所欲為」、「男性無法真心誠意悔過，自以為收斂即對得起妻子」、「要不是被逮到，他怎麼會回頭」、「外遇是丈夫之炫耀品，用以傷害妻子」、「丈夫還有良心的話，不知道自己(指諮商師本人)的感受會不會好一點」、「男人只要老婆不吵不鬧，他一樣有他的辦法尋歡作樂」、「男人外遇後也無法悔改」、「丈夫敢做又不敢當，優柔寡斷」等均被視為反對丈夫。

六、中立：諮商師對婚姻關係困難保持客觀之看法與態度，認為夫妻對關係困難均負有責任，在諮商情境中會用大約相同強度的問題面質雙方，並提供相同的關懷與滋潤，避免與某一方聯盟來打擊另一方；例如「夫與妻在挽救婚姻關係上的想法與做法均充滿歧見，且讓關係更為惡化」、「夫妻應思考如何共同克服外遇所造成關係信任上之陰影」、「處理他們角色及互動的模式」、「讓他們能交換愛與保證，改善相處方式」、「讓夫妻皆能看清自己及對方之需要，找出平衡點」、「婚姻危機的出現是雙方面的問題，鼓勵並增強雙方為婚姻努力的動力」、「正向解釋雙方的行為意義」等均被視為中立。

七、社會文化意識：諮商師在概念化案主夫妻問題時，以文化或社會化(socialization)之角度解釋、處理當事人之行為或夫妻關係困難；例如「文化就是容許男性有外遇特權，所以丈夫才會以為改過就好了」、「這個社會讓男人誤以為有外遇就有男性雄風」、「外遇是父權社會結構的產物」、「幫助夫妻看到文化期望對他們關係/角色的影響」、「文化允許男人有較多資源獲取權力」、「社會脈絡對成功男人/妻子的定義影響他們的角色扮演」等均被視為具有社會文化意識。



Counselors' gender bias in conceptualizing marital problems

Li-An Kuo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counselors' gender bias in conceptualizing marital problems. The participants included 29 experienced and 29 novice counselors. 58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view the first 20 minutes of interview conducted by the researcher, and their responses on free-response dependent measure were examined for possible gender bias. Through content analysis, there were seven categories emerging regarding the theme of gender bias: neutrality, for wife, for husband, against wife, against husband, gender concepts, and social-culture concepts.

The main findings were that both experienced and novice counselors tended to be neutral to the couple. However, there was a lack of usage of social-culture and gender concepts. This was particularly true of the novice counselors.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counselors' working experience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gender concepts, social-culture concepts, and neutrality. Gender concepts, social-culture concepts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against husband. Married counselors were more neutral than unmarried counselors. Unmarried counselors were more likely to be for wife, against wife, and for husband than married counselors. There were no differences regarding the frequency of seven categories used by male and female counselors.

The results of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participant critiques revealed subtle forms of gender bias. Implications for clinical training,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nd future research were discussed.

Key words: counselor, couple therapy, conceptualization, gender bias

